1937年9月-12月，一个由北平学生组成的剧团转战山东，宣传抗战。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国家精英，如著名演员张瑞芳、著名作家陈荒煤、中共高级干部荣高棠；有的走向反面，如参与策划谋杀周恩来的军统特务谷正文，不过当时的他尚是一名热血青年。他们因抗日救亡并肩战斗，却因信仰不同分道扬镳。

山东1937：来自北平的抗战剧团

红色记忆

□ 于建勇

1937年，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济南慰问伤员

《打鬼子去》剧照，陈荒煤(中)、张瑞芳(左)、张昕(右)

1937年8月，一个由北平学生组成的移动剧团来到济南。

一个月前，“七七事变”爆发。因津浦铁路北段被破坏，大批流亡者取道天津，乘轮船至青岛，再经胶济铁路到济南，转津浦铁路南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即是其中之一。

剧团辗转到济南

这个剧团是遵照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的指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组织成立的。

“七七事变”之后，黄敬指示：“北平已非久留之地，除留校做工作的，北平学生中的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力量大部分都要撤出北平，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鉴于抗日中心将由北平移至上海，黄敬让剧团先到上海，取得公开身份和活动经费，然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展救亡工作。当时河北、山东已成为抗日前线。

这个剧团的成员尽管当初并不起眼，但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人成为文化界、演艺界或政界的精英——

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体委秘书长等职。

张瑞芳，时为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民先队员。后成为著名电影演员，2007年获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

张楠，张瑞芳的姐姐，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

陈荒煤，左翼作家，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此外，还有杨易辰(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王拓(时为中国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司长)、管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委工作)、方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电部技术改进局局长)、程光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春市副市长)等成员。

1937年8月7日，荣高棠、张楠、陈荒煤、张瑞芳、郝龙(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乘坐从北平开出的第一列火车去天津，打算乘船赴上海。流亡学生在船上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不料，船到烟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张楠建议取道青岛，改去济南，得到大多数同学的响应。

张楠的三舅在胶济铁路青岛机务段工作，“民先队”总负责人李昌(时为清华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棠、张楠代表同学们向他求助。他帮忙找到了一节车厢，挂在前往济南的货物列车后面。

大明湖畔创作《打鬼子去》

8月的济南，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平津流亡学生。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成立了“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接送和动员平津流亡学生参加抗日工作，并设立“民先”驻济联络站和山东省救亡促进会。

“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他们安排在大明湖附近的一所中学住下。随后，荣高棠立即给黄敬发信，告之剧团的行踪。陈荒煤则开始创作《打鬼子去》。这部作品是他坐在砖头上就着长凳写出来的。由于太过投入，常常废寝忘食，剧本没几天就写成了。张瑞芳则凭着记忆把《黎明》、《放下你的鞭子》的脚本整理出来。

几天后，杨易辰、方深、郭同震、庄璧华、管平、王拓、程光烈等成员也相继到达济南。他们受邹韬奋《战地移动剧团》报道的启发，将原“农村服务宣传团”改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农村服务宣传团”是1937年7月15日成立的，荣高棠任党支部书记，党员有杨易辰、张楠、程光烈，不过当时处于保密状态，以至于陈荒煤1938年到了延安之后才知道剧团里有党组织，而自己因为在剧团始终和党组织接不上头苦恼了一年多。陈荒煤早在1932年就已入党。

接到荣高棠信件的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的江凌秘密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员关系的任仲夷(1980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他们在济南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们便决定到南京去。

那天的济南火车站，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棠担任大队长，他奔前跑后，指挥同学们上了火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

当时，张楠身上藏着黄敬写给五个人的介绍信。信是用油纸裹成一支细纸棒，塞进一支半空的牙膏筒里。

家世显赫的张家三姐妹

到南京后，他们打听到黄敬介绍的五个人中，只有沈钧儒在南京。沈钧儒，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主席。1936年5月，与宋庆龄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荣高棠、张楠找到他时，他刚于7月底出狱。

受黄敬之托，沈钧儒把他们介绍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邵力子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又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次长张道藩(1930年曾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务长)。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剧团在南京国立戏剧专门学校作了首场演出。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前来观看。演出大获成功，张道藩决定把他们纳入教育部属下的剧团，没想到被他们婉言谢绝。他们请求到山东，理由是：同学们都是北方人，留在南方宣传恐有语言障碍。再者，山东、河北离家近，仗打完了好回家读书。而真实原因则是：黄敬交代要回到华北地区活动。

尽管张道藩很不高兴，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同意剧团赴山东活动，归山东省教育厅领导。当时的教育厅长是何思源(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在南京期间，剧团成员又增加了姚时晓(时为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张昕(张瑞芳的妹妹)和胡述文(时为中国大学学生，民先队员)，全团人员共15人。

在准备回山东前，荣高棠、张楠分别与沈钧儒、张道藩辞行。当张道藩得知张楠的父亲是陆军中将张基时，有些吃惊。

张基，北伐战争开始后，任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在1928年4月的徐州战役中，因无法率部如期到达上级指定地点饮弹自尽。北伐战争结束后，第一集团军总指挥部在南京为张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地送来“精神不死”的挽幛。

张道藩恳切地对张楠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两个妹妹这么跑，多危险！”张楠说：“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来干吗！”张道藩哪里会想到，这位有着显赫家世的女学生，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韩复榘允许剧团巡演

9月底，剧团到达济南。何思源将其改名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由张道藩派来的钟志青(后来方知是中统特务)任团长。何思源承诺，剧团所需经费由教育厅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20元，办公费实销(后改为每月200元)。

就在这时，途经济南的黄敬悄悄来到剧团驻地——山东民众教育馆，得知剧团有了合法身份和经济来源，他很满意。黄敬还给张家三姐妹带来了三件丝棉背心。这是三姐妹的妈妈精心缝制的，上面还绣着各自的名字。三姐妹倍感温暖，又增添了些许牵挂。

鲜为人知的是，张家在北平的大宅院，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三姐妹的母亲(原名杜健如，后改名廉维)也是一位革命工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母亲》，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主演则是她的二女儿张瑞芳)。

移动剧团在山东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首场演出。之后，在省政府礼堂演出时，省府主席韩复榘也来了。

看了演出，韩复榘非常满意，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允许剧团在山东境内整个第三集团军巡回演出。韩复榘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剧团辗转山东各地，特别是军营一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鼓舞军民积极投身抗战。

和军队的接触也有意外。一次演出后，剧团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批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这些散兵看到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见事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而更来劲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的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军官要求剧团将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犯，冒犯。尽管张氏三姐妹父亲已逝，但余威犹存。

“流浪”中呼吁战斗

为剧团在军队驻地活动方便，团长钟志青拿来空白胸章说，军衔可填少校、上尉。程光烈字写得好，就由他填写胸章的姓名和军衔。他们戴上胸章，果然进出城时不再受阻拦，行动自由多了。

令剧团成员没想到的是，因为所谓的“军衔”问题，他们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说是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而剧团成员郭同震后来的身份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郭同震，就是后来的谷正文。1955年，旨在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就是他参与策划的。“文革”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不过，当时在剧团的郭同震，尚是一名充满热血的爱国青年。

在济南，剧团工作了三个月，演出数十场，还录制了抗日歌曲，通过电台播向全国，用稚嫩的声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剧团经常移动，移动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乘火车、坐大卡车、步行、间或骑马。战时乘火车不需买票，能挤就挤上去。路上大多住在学校，打地铺。有时住在可观天象的陋室；有时住在舞台的后台；有时住在破火车厢里……

转眼到了秋冬季节，济南的天空越发冷峻。日军铁蹄沿津浦铁路，一步步向济南逼近。1937年9月24日，沧州陷落；10月3日，德州陷落；11月上旬，攻至黄河以北地区。

11月15日下午，日军开始向济南北10公里、黄河北岸鹊山进攻，6时占领，随即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天傍晚，为阻止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韩复榘下令炸毁了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12月27日，济南沦陷。听到这个消息时，剧团正在曹县。接着，泰安失守、济宁失守，河北、山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

诀别难舍同志之情

济南沦陷后，剧团撤退到徐州，并在此遇到了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将来，我一定战死沙场以明心迹。”1940年5月，张自忠在襄樊会战中为国捐躯。让剧团成员印象最深的是，观看《烙痕》时，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强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下来。

此后，剧团转战于河南、安徽等地。1938年8月底，根据中共长江局委员董必武的建议，剧团全体成员赴延安休整。董必武还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介绍信。

在这个小小的剧团里，国共两方面的力量始终在暗中较量。何思源曾希望剧团北渡黄河回到山东去。一直以来，何思源希望这些年轻人能真的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这些年轻人提出要到西安去。

在郑州分别之际，何思源慷慨地送给剧团400元钱做路费。多年以后，在改换了门厅的北京，作为高级统战对象的何思源见到了中共高级干部荣高棠，谈起那次分手，何思源说：“怎么样，我当时对你们还是不错的吧？”他还说，他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西安，而是延安。

人各有志，何思源没有强求。在“最后的晚餐”上，大家开怀畅饮，何思源醉了，钟志青哭了，大家都哭了。即使明天是敌手，今天也是同志；即使分属两个阵营，此刻也有难舍之情……

剧团从1937年7月成立，到1938年10月奔赴延安，一年多来，他们走过了两万多里的漫漫旅程。这段战火中的青春岁月，被作家严平用浪漫的笔触，写成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

相传，康熙十八年升阳观大殿落成后，住持刘道长忽见一道人影进入新修建的大殿内。道长进大殿查看，并无一人，但见大殿左侧墙壁上留有墨迹未干的七言律诗一首，疑是吕洞宾所为。吕祖庙东侧建堂馆时，遂取名“题壁堂”。

神韵犹存古戏楼

地名故事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冯心如

题壁堂二门北立面

题壁堂彩绘 (朱立明 摄)

正所谓“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在我国古代，戏楼往往是整座庙宇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济南老城区悠悠老街的掩映中，坐落着一幢木质架构的古戏楼题壁堂。作为升阳观的一部分，题壁堂也曾是济南热闹非凡的古戏楼。

梦会吕祖建神庙

自省府东街出发，沿西公界街向北走上百余米，就到了升阳观、题壁堂所在的寿康楼街。西侧的升阳观正殿已修复完毕，庄严雅静，香火缭绕。正在修复中的题壁堂，虽被满满的脚手架遮住了本来的面目，但高大门楼上的砖雕、彩绘依稀可见，沧桑历尽，风韵犹存。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科科长艾楠介绍，升阳观总建筑群占地3750平方米，是为供奉神话人物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的庙宇，故又称“吕祖庙”。

吕洞宾虽在八仙中排行不是老大，但在八仙之中，吕洞宾的名声却是最响的。因为他行踪不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被视为维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神仙。所以，供奉吕洞宾的吕祖庙各地都有，仅济南过去就有三处，位于寿康楼街的升阳观就是其中的一处。

吕祖庙始建于金代。明末，济南知府樊时英重修吕祖庙。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吕祖庙西院又修建了一座大殿，名为升阳观。此后，吕祖庙渐渐被人们称为升阳观。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告诉记者，升阳观原来是座由大门影壁和三间东西厢房正殿围成的四合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调查济南古建筑时曾单独调查过升阳观，1993年升阳观仅余正殿一座。正殿为三开间一殿一卷硬山结构，造型稳重而富有变化，它大屋脊为七架梁，卷棚为四架梁，进深共四间，殿内梁枋绘有精美的彩绘，山墙上还嵌有明末济南知府樊时英书写的吕祖像赞等石碑。

关于升阳观的由来，有这样一段传说。八百多年前的一天，金人元好问在太原街头闲逛，一个长须飘洒、身背宝剑的道人突然上前，邀请他一同饮酒就餐。元好问生性好交友，自然不加推辞。推杯换盏中，两人谈得甚是投机。道人自我介绍说，他就住在天下闻名的趵突泉边、大明湖畔，那里景色宜人，并邀元好问一同前去游历。元好问答应说，将来有机会一定前往，与道人临泉对饮。

数年后，元好问恰好调到济南任知县，乘兴游览趵突泉、大明湖等地。此时，他早已忘记了先前与道人的约定。游玩之余，他在泉边小憩，迷迷蒙蒙中看见当年的长须道人走到跟前问他：“太原一别，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为什么到了我的家门还不来和我见面叙旧呢？”元好问诚惶诚恐，正想答话，不料猛然惊醒，这才想起当年和道人相约一事。他起身，赫然发现旁边的墙壁上吕洞宾的画像正是当年在太原见到的长须执剑道人。于是，元好问出资在济南趵突泉、大明湖畔修建了吕祖庙。

在济南民间，元好问梦会吕洞宾的故事已流传了千百年，后代诗人也多有题咏。如明代诗人王象春曾赋诗曰：“回老犹能恋此乡，远时相约近时忘，黄粱未熟人生醒，可是泉香是米香。”

仙人题壁名此堂

升阳观东侧的题壁堂，修建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题壁”二字的得来，颇有渊源。

相传，康熙十八年升阳观大殿落成后，住持道士刘道长忽见一道人影进入新修建的大殿内。道长进入大殿查看，并无一人，但见大殿左侧墙壁上留有墨迹未干的七言律诗一首：

“曾否方年旧酒楼，松亭水色静悠悠。熏风日跻蓬莱岛，笻仗常经此地游。世法须从身上想，机关宜向个中求。离离青草会心处，何事浮生空白头。”

刘道长根据“木石道人”的署名和诗的意境，疑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为。

到清嘉庆八年，吕祖庙东侧建堂馆时，墙壁上的字迹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已变得模糊不清，为便于传存，抄录刻于石碑上，并为堂馆取名“题壁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张景堂等人捐资对题壁堂扩建，并在整个建筑群的西南角新建了学堂。自此，吕祖庙分成了升阳观和题壁堂两处建筑，它们也成为古城内一处集正堂、戏楼、大罩棚、道观、学堂等建筑为一体的，具备相当规模的道教建筑群。

步入题壁堂，在脚手架与防护网的密集遮挡下，题壁堂的真容难以统观，却并不妨碍记者感受它的壮阔与精巧。艾楠告诉记者，由北往南，题壁堂分为三个院落组成，第一个院落为大门、东西倒座房；第二个院落为二门、东西抄手游廊、抱厦、大堂戏楼；第三个院落由后寝殿、东西厢房、东西耳房等组成，已经具备了现代戏院的使用功能要求，虽历经200余年，其建筑形式和结构本体保存完好。

在大厅中，记者发现，大厅由24根粗大红柱支撑，东西两侧是两层看台。而这些柱子并非是直通到顶的，一层大厅的柱子相比二层少而粗，让空间显得更为空阔。

姜波说，这是宋元以后我国传统木构建筑中“减柱法”格局的典型代表，通过减少部分内柱，增加了建筑的室内空间。这种建筑模式，在山东并不多见，存留至今颇为珍贵。

“由于题壁堂为木构架建筑，木材的坚固性差，易被腐蚀，损毁较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困难。我们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召集专家一起商讨。现在，木构架施工基本完成，主要是更换了十二根檐柱，对部分损毁金柱、童柱进行了墩接。”艾楠说，对于题壁堂的修缮已有多次。1996年、2006至2007年，由市财政拨专款对大堂、大门、二门、东西抄手游廊进行了修缮，对大堂危险部位进行了简单的加固。这次大整修是从2013年10月26日开始的，预计到2014年9月30日结束，主要是对屋面和木构架进行维修。后期还计划对后院进行整修。

门庭冷落忆繁华

作为升阳观的一部分，200多年来，题壁堂发挥着诸多的功用，但人们知道的更多是它作为庙会戏楼所拥有的繁华。

在题壁堂后院住了30多年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听说，很久以前，题壁堂是科举的地方，是考试的地方。在清朝末年时，是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各种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日夜不绝。还有人传说，清末梁启超曾在此发表演讲，孙中山曾在此接见过国民党人士，甚至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先生还曾在这里演出过。后来这里改为学校，也曾作为教师的宿舍。现在，后院里仍住着几户人家。

低矮的房屋、各种堆积的杂物，让题壁堂的后院略显拥挤。刚下过雨，湿漉漉的地上青苔片片，石榴树上硕果累累。200多岁的老院子，颓唐中孕育着生机。

“我在这里住了50多年了，是最早住进这里的居民。”76岁的杨育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题壁堂就一直是学校用地。之前是私立大明湖小学，公办成为高都司巷小学的二分校，“我是高都司巷小学的幼儿园教师，1962年从舜井幼儿园调过来。”

据杨育华介绍，当时，题壁堂的东西屋、厢房都是教室。大戏台子是大教室。南边东屋、西屋是公办幼儿园。“当时房子很新，很干净。柱子、瓦都很好，地是青石小方砖。后来，学校学生少了，教室多了，就合校了。学校就让没有房子的老师住到这里，最多的时候，这个院子住了11家。”

虽然房子时有漏雨，有的土坯房甚至被列为危房，但和杨育华一样，院子里的好多老住户依旧住在这里。对于题壁堂，他们心有纠结，既觉得这么多年住习惯了，有些不舍，又期待着居住条件能够得到改善。

告别了往昔的繁华，“门庭冷落”的题壁堂沉淀为另样的“财富”。姜波说，题壁堂是山东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戏楼，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它的修复，会让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熠熠生辉。